

中苏外交战略协调背景下的 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

陈开科

内容提要 20世纪30年代,德、意、日等法西斯国家形成东西战争策源地。受到威胁的中苏抓紧复交,并形成维护自身国家安全利益的外交战略。苏联的外交战略是:首则倡导建构集体安全体系,防止战争;次则军事援华以拖住日本,避免东西两线作战。而中国的外交战略是:首则寄希望于日苏战争,或推动苏联直接参战;次则获取苏联的军事援助,独力抵抗日本。最后,经过艰难协商,中苏均达成了自己的最低外交战略目标,签署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苏联开始军事援华。其中,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培训中国空军,重塑中国空军的肌体,同时,亲自驾机参加战斗,消灭了日军大量有生力量,为中国抗日战争过渡到相持阶段立下汗马功劳。为此,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也付出巨大牺牲,其英勇事迹成为中苏两国人民友谊的象征。

关键词 外交战略 《中苏互不侵犯条约》 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

20世纪30年代是东西方国际关系格局发生剧烈变化的时期。德、意、日分别在东西方形成战争策源地,欧美列强则采取绥靖政策。正是基于远东、欧洲的这种危局,一度反目的中苏两国都主动采取措施,加速两国外交关系正常化的步伐。

1932年12月12日,中苏两国宣布复交。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七七事变,中国开始全面抗战。1937年8月21日,苏联为在远东实现其外交战略目标,推动签署《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确立了苏联援华抗日的政治基础。基于该约,苏联按照既定的外交战略,开始大规模军事援华活动,其中比较重要的一项是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以下根据行文需要或简称“志愿队”)。据不完全统计,80多年来,中国出版发表的相关学术、通俗类的史学论著及资料约270余种。^①其中,通俗类史学论著占绝大多数,包括新闻稿、回忆录、日记、故事、口述等各种体裁,受众远远超越严肃史学;约

^{*} 本文系重庆市“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委托课题“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三。

^① 基于中国知网及出版书目的调查结果。

有20多种抗战时期“中苏关系”的专著^①、80多种学术论文间接地涉及“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此外,学界努力挖掘相关的历史资料,取得很大成就:第一类资料是收藏在中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台北“国史馆”)和俄罗斯军事历史档案馆(РГВИА)里的未刊档案资料,以及已编未刊的《中俄关系历史档案集(1652—1965)》^②;第二类是已刊资料集,包括两种中文“档案资料集”^③、两种俄文“档案资料集”^④、一种日记^⑤、三种图片摄影资料集^⑥、数种中俄文回忆录^⑦,以及部分翻译和整理发表在各类学术刊物上的相关资料片段。由中国学者创作的专题研究论文约有四种^⑧,但无论资料涉及,还是研究的深广度都有所欠缺。因此,亟需比较全面深入的专题研究。

本文力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广泛利用中俄文档案资料,详细论述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在华的生活、战斗历程及功绩。

一、中苏外交战略的协调:《中苏互不侵犯条约》

毫无疑问,1937年签署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是抗战前期苏联军事援华的政治基础。

当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扶植伪满洲国、侵占东北时,中苏两国都感受到来自日本的战争威胁,开始考虑复交,共同应对来自日本的侵略压力。

1932年6月,中苏两国尚在复交谈判时,中方即提出签署《中苏互不侵犯条约》,隐含在不侵犯中国主权的前提下复交之意。与周边国家签署互不侵犯条约原是当时苏联在欧洲地区建构集体安全体系的一种形式。因此,中国提出签署《中苏互不侵犯条约》颇合苏联心意。然苏联不愿有条件复交,故坚持先复交,后谈约。^⑨1932年12月12日,中苏两国宣布复交。此后,中苏正式开始就互

① 彭明:《中苏友谊史》,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73—175页;李嘉谷:《合作与冲突:1931—1945年的中苏关系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8—154页;王真:《动荡中的同盟:抗战时期的中苏关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8—135页;薛衡天、金东吉:《民国时期中苏关系史》(中),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116—121页;刘维开:《空军与抗战》,军事研究编篡委员会编:《抗战胜利四十周年论文集》(上),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6年版,第267—327页;王正华:《抗战时期外国对华军事援助》,台北,环球书局1987年版;陈慈蓉:《抗战初期苏联对华外交与军援》,台北,《中华民国史专题第三届讨论会》抽印本,1996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著:《抗战时期苏联援华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唐学锋:《中国空军抗战史》,四川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6—133页;汪金国:《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研究:战时苏联对华政策》,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0—89页;欧阳植梁、陈芳国主编:《武汉抗战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等等。

② 李静杰主编,薛衡天、陈开科等协编:《中俄关系历史档案集(1652—1965)》第23、24卷,未刊。

③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李嘉谷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33—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④ 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 т. 20 - 24, М. 1976—2000гг.;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в. Т. IV: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37—1945гг. Кн. 1: 1937—1944. М., 2000, 870с.

⑤ 龚业梯:《抗战飞行日记》,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

⑥ 李裕主编:《中苏美空军抗日空战纪实》,北京航空联谊会、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合总会,2005年内部发行,第81—148页;曾景忠等编著:《血色长空——空军抗战与抗日胜利纪实》,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蒋妙玉主编、赵大川编著:《中国对日空战画史》,杭州出版社2005年版。

⑦ В небе Китая (1937—1940).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советских летчиков-добровольцев. Сб. ст. М., 1986, 381с.

⑧ 王正华:《抗战前期的苏联空军志愿队》,台北,《中华民国史专题第二届讨论会论文》抽印本,1993年;高新生:《参加中国抗战的连年来志愿飞行员》,《新疆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路晓会、凤跃:《论苏联志愿者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作用》,《漳州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Чэнь КайКэ, Советские летчики-добровольцы на антиапонской войне в Кита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научн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Сборник Великого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го-Известная и Неизвестная: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память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М. 2015, г.

⑨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公报》第5卷第4号,“附录”,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78页;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 т. 15 (01 января 1932—31 декабря 1932), М., 1969, с. 392—394.

不侵犯条约进行谈判。基于国际局势的不断变化,中苏两国围绕条约的谈判,慢慢形成了各自的外交战略。自1932年6月至1937年8月,中苏有关签署互不侵犯条约的谈判历时五年多,约可划分为两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1932年至1936年底西安事变,中苏双方各自提出条约草案并开展讨论。由于期间中苏双方各自所面临的国家现实利益及历史问题十分复杂,矛盾重重,谈判几无进展。第二个时期,1936年底至1937年8月21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署。正是在这个时期,中苏两国开始形成各自的外交战略。

1936年11月25日,德日签署《反共产国际协定》。该协定使苏联面临法西斯势力东西夹击的危险,苏联迅速形成以维护自身国家安全为核心的外交战略:力倡与英法及苏联周边国家建构集体安全体系,预防战争——这成为当时苏联外交战略的最高目标。^① 由于欧美列强对德日持绥靖政策,集体安全体系的建构未能成功。于是,苏联在日本数次拒签互不侵犯条约后^②,加快苏中关系正常化步伐,并且承诺军事援华,试图从战略上扶持中国牵制日本,以避免未来东西两线作战——这点构成苏联外交战略的最低目标。

然而,中国却不满足于苏联的间接军援,不满足于签署所谓的互不侵犯条约,即不满足于实现战时外交战略的最低目标,而开始追求外交战略的最高目标:或寄希望于日苏战争^③,或努力促使苏联直接参战。^④ 中国外交战略的最高目标约于1935年7月提出,形式是与苏联签订互助条约。7月4日,孔祥熙拜访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Д. В. Богомолов),提出讨论签署《中苏互助条约》。^⑤ 10月18日,蒋介石亲自约见鲍格莫洛夫,认为《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只是表面举动”,他“希望有实质性的真正促进中苏亲密关系并能保障远东和平的协定”。^⑥ 12月28日,苏联外交部电告鲍格莫洛夫:要求弄清蒋介石建议签署互助条约的真实意图,包括其对互助条约的具体想法、苏联及中国政府承担的义务等具体问题。^⑦ 为此,1936年1月22日,鲍格莫洛夫拜见了蒋介石。蒋介石表示:不强求苏联帮助中国保卫那些已被日本侵占的地区,例如察哈尔的六个县,然一旦签署《中苏互助条约》,则要求“当日本企图侵占蒙古、绥远或山西时,苏中两国应根据条约承担互助的义务”。^⑧ 这表明:此时中国的外交战略已形成并开始追求实现自己的最高战略目标——将苏联直接拖入对日战争,而这点正是苏联政府最忌讳的。1936年12月12日,中国发生西安事变。针对中国政治局势的新变化,苏联政府采取措施,因势利导,试图将中国变成实现自己外交战略的有

① И. А. 基里林主编,邢书纲等译:《国际关系和苏联对外政策史(1917—194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79页。

② 安·安·葛罗柯柯、鲍·尼·波诺马廖夫主编,韩正文等译:《苏联对外政策史》上卷(1927—194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80页。

③ 在20世纪30年代的《蒋介石日记》中,随处可见“俄倭形势渐紧”“俄倭冲突”“俄倭战争”(如1935年4月8日)等记述,可见蒋十分关注“俄倭形势”,指望日苏战争的念想直到1937年《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前都还存在。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 т. 19(01 января — 31 декабря 1936), М., 1974, с. 270. 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 т. 20(01 января — 31 декабря 1937), М., 1976, с. 389.

④ 抗战前期,蒋氏一直努力促使苏联直接参战,但不断遭到苏联的明确拒绝。1937年11月12日、1938年2月初,斯大林两次明确拒绝直接参战。(АПРФ. Ф. 45, Оп. 1, Д. 32, Л. 32.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 Т. IV: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37—1945 гг. Кн. 1: 1937—1944. М., 2000, с. 199.) 然而,直到1938年底,蒋介石还在酝酿签署《中苏保障东亚和平协议草案》,主旨仍然是促使苏联直接参战。理所当然,同样遭到苏联的拒绝。参见薛衡天、金东吉《民国时期中苏关系史》(中),第85—95页。

⑤ 李玉贞译:《中苏外交文件选译》(上),《近代史资料》总79号,1991年,第218页。

⑥ 李玉贞译:《中苏外交文件选译》(上),《近代史资料》总79号,1991年,第220页。

⑦ 李玉贞译:《中苏外交文件选译》(上),《近代史资料》总79号,1991年,第225—227页。

⑧ 李玉贞译:《中苏外交文件选译》(上),《近代史资料》总79号,1991年,第228页。

利因素:一是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约束、引导中国共产党改变策略,联蒋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中国变成拖住日本战略泥潭;二是由原来考虑签署《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单层面外交战略发展为多层面外交战略,我们姑且将这种变化概括为“苏联对华外交战略三步曲”:第一步即最高战略目标是策动以中国为中心的《太平洋区域性互助条约》,构建远东集体安全体系,以消弭日本给苏联带来的威胁;第二步,如果第一步实现不了,就退而求其次,签署《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达成自己外交战略的最低目标:军援中国,拖住日本北进步伐;第三步,根据国际局势发展的情况,最后才考虑签署《中苏互助条约》。苏联对华外交战略的这种新举措自1937年2月初始,到4月初最后形成,期间中国政府也曾有一定程度的响应。^①4月12日,鲍格莫洛夫在南京与外交部部长王宠惠会谈,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了对华外交战略的“三步曲”。

如果说上述苏联所提出的外交战略“三步曲”在表述上尚有些不太清晰的话,那么,到7月16日,鲍格莫洛夫在跟孙科谈话时就十分明确地阐述了“三步曲”之主次及时间先后顺序:首倡《太平洋区域性互助条约》;次则《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作为《太平洋区域性互助条约》的结果并在《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之后,再考虑谈判双边互助条约。^②也就是说:“三步曲”之中,《太平洋区域性互助条约》摆在首位,是苏联外交战略的最高目标;次则签署《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军援中国,让中国拖住日本,使苏联避免东西两线作战,这是苏联外交战略的最低目标;至于互助条约则明确列为未来某种特殊条件下的考虑,苏联根本没打算即时签订。因为中苏一旦签署互助条约,就意味着苏联马上要参加对日作战,如此,苏联将陷入东西两线作战的困境——这与苏联外交战略的最低目标相悖。

此后,苏联和中国为签署《太平洋区域性互助条约》在国际上做了一定程度的努力^③,但最终导致《太平洋区域性互助公约》计划落空的却是美国的坚拒态度。^④美国的态度继而影响到中国和列强。^⑤如此一来,苏联实现其外交战略最高目标的努力就白费了,只能退而求其次,追求实现其外交战略的最低目标。7月19日,鲍格莫洛夫告知陈立夫:要购买苏联武器必须先签订互不侵犯条约^⑥,并拒绝谈判互助条约。^⑦只要签署互不侵犯条约,苏联就可以军援中国。^⑧于是,在苏联的坚持下,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侵略,英美列强的对日绥靖,中国政府毫无办法,只能及时调整自己的外交策略,收回互助条约的奢望^⑨,回到谈判签署《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即实践苏联外交战略的轨道上,退而求其次,以图实现自己外交战略的最低目标即获取苏联的军事援助。这一点,蒋介石在7月末的反思中有所体现。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他准备屈从于苏联的外交战略。^⑩

1937年8月21日,中苏签署《中苏互不侵犯条约》。^⑪尽管从条约谈判的过程看,该条约完全是苏联外交战略主导的实践成果,但从条约内容看,却是中苏外交战略协调的产物。条约的主旨既

① 李玉贞译:《中苏外交文件选译》(上),《近代史资料》总79号,1991年,第190—191页。

② Там же с. 385.

③ 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 т. 20(01 января - 31 декабря 1937), М., 1976, с. 266.

④ 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 т. 20(01 января - 31 декабря 1937), М., 1976, с. 337 - 338.

⑤ Там же, с. 385.

⑥ Там же, с. 393 - 394.

⑦ Там же, с. 400 - 401.

⑧ 李玉贞译:《中苏外交文件选译》(下),《近代史资料》总80号,1992年,第204页。翁文灏:《一九三七年访问英、德和苏联的回忆》,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63页。

⑨ 但蒋介石直到1938年中,都在盘算签订《中苏秘密军事协定》,甚至准备在必要时访问莫斯科,试图将苏联拖入对日战争。АВПРФ. Ф. 0100, Оп. 22, П. 190, Д. 10, Л. 53 - 58; АВПРФ. Ф. 05, Оп. 1, П. 145, Д. 96, Л. 88 - 89.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 Т. IV: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37—1945 гг. Кн. 1: 1937—1944. М., 2000, с. 258, с. 261 - 262.

⑩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7年7月31日,“本月反省录”,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

⑪ 李玉贞译:《中苏外交文件选译》(下),《近代史资料》总80号,1992年,第217—218页。

体现了苏联外交战略的底线,也从最低限度上照顾了中国的外交战略利益。尤其第三条,从法理上确认了1924年《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继续有效,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中国的领土主权,基本符合蒋介石对苏外交战略的初衷。

需要稍加说明的是《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与苏联军事援华的关系问题。从条约的条文看,没有一个字涉及苏联军事援华问题。也正因为如此,蒋介石一度对签署如此条约不感兴趣。其实,《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是苏联在远东实现其外交战略最低目标的关键:其一,苏联外交战略的关键是要暂时消弭苏日战争的任何可能性。《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是一个公开的国际条约,里面不能有公开军事援华抗日的的内容,以免刺激日本北进;其二,用鲍格莫洛夫的话来说,中日当时正秘密和谈,中国有可能利用苏联军援的武器伙同日本攻打苏联。公开的国际性互不侵犯条约对此无疑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限制;其三,中苏在条约谈判的同时也就苏联对华军事援助基本达成协议,并且苏联答应签署《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后立即给予军事援助。因此,《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条文虽然没有直接涉及苏联军事援华,但毫无疑问,《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是苏联军事援华的政治基础。但蒋介石似乎不太理解当时苏联的外交战略,他对苏联军事援华始终存在疑虑,以致一度坚持先签署军火订购协定或同时签署军火订购协定和互不侵犯条约。^①

条约一签订,蒋介石就迫不及待地要求苏联尽快将需要购买的武器弹药运往中国。^② 苏联在抗战时期的军事援华活动终于拉开了序幕。抗战时期苏联军事援华,一是发放对华贷款达2.5亿美元,以便中国政府购买武器弹药;二是援助修筑西北运输线,以便运输援华军用物资,西北运输线成为抗战前期中国最重要的一条国际生命线;三是向中国派遣了大批军事顾问和空军志愿队。尤其苏联空中健儿直接到中国参战,客观上为中国抗战立下汗马功劳。

二、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的组织、派遣及相关问题

如前所述,20世纪30年代苏联面临特殊危急的国际局势,不得不确立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目的的外交战略。基于这种外交战略,苏联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中国努力运作的《中苏互助条约》,使中国将苏联拖入对日战争的战略目标落空。但以当时中日战争的具体情形而言,西方列强普遍采取孤立主义政策,不但不帮助中国,反而在资源方面帮助日本。苏联虽拒绝直接参战,但也明白:如果不给中国以实际帮助,则势必影响苏联外交战略的实施。基于此,苏联在主导建构远东集体安全体系不成的前提下,也退而求其次:先签署《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然后秘密军事援华。就当时中日战争的实况而言,日本空军无限制地对中国进行狂轰滥炸,给中国军民造成巨大损失。蒋介石就明确表示:中国极其需要苏联的飞机支援。^③

当时中日经济基础相差较大,中国的综合国力根本无法与日本相比。战前,中国政府也曾努力建设空军,但缺乏制造飞机的工业基础,飞机只能从外国购买。据统计,战前中国空军列入编制的各式作战飞机约296架,基本合格的飞行员仅600多人,机械技术人员230多人^④,实际作战能力十分有限。而日本工业基础雄厚,到1937年,能年产飞机1500架。七七事变前,日军已拥有作战飞机2700多架。中日开战后,中国空军勇敢顽强,前三个月就击落、击毁日机128架。^⑤ 但自身损

① Там же, с. 438.

② Там же, с. 469.

③ Там же, с. 463.

④ 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蓝天碧血扬国威——中国空军抗战史料》,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1—4页。

⑤ 唐学锋:《中国空军抗战史》,第112页。

失亦较大,且得不到补充。淞沪抗战后,中国仅剩飞机20多架^①,完全丧失了制空权。中国军队和老百姓被动挨打,损失惨重。

上述情势表明,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既是苏联实践自身外交战略的关键步骤,也是中国抗战所急需,是中苏外交战略的交叉点。所以,当中国提出要聘用苏联飞行员时,苏联方面立即响应。而中国方面则根据战场的实际需要,相关需求不断发生变化:先是“飞行员”,然后是“飞行教官”,乃至“空勤技术人员”,需要的数量也越来越多。1937年8月14日,中国就已提出聘请苏联飞行员的要求。^②21日,中国驻苏大使告知苏方,中国将派遣沈德燮上校到莫斯科接收飞机和“30名飞行员”。^③27日,蒋介石在接见苏联驻华全权代表时,明确请求苏联允许“苏联飞行员以志愿人员加入中国军队”。^④9月9日,中国军事代表团在莫斯科与苏联举行第一次谈判时,提出所需志愿者的具体数目:“重轰炸教官十五员、轻轰炸教官十员、驱逐机教官八员,飞行教官七员、技术人员三十员”。17日,中苏第四次商谈购买武器时,苏方同意向中国派遣:“(A)C-5重轰炸机飞行教官九员,技师六员,仪器教官二员,无线电教官一员。(B)И-15驱逐机飞行教官六员,技师六员,仪器及其他三员。(C)И-16驱逐机飞行教官九员,技师九员,其他二员。(D)修理技术人员(每种飞机十员)共三十员。(E)制弹技师五员。(F)总工程师一员。共计八十九员。”^⑤以上所述,均为飞行教官等各类飞行技术人员,主要任务不是直接参战,而是帮助培训中国飞行技术人员,但这种帮助难解中国近渴。一般认为,1937年12月,苏联方面始正式向中国派遣“空军志愿参战员一大队,约百五十人来华”。^⑥实际上,根据美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保存的相关史料,早在1937年10月,第一批苏联空军志愿队就已经组织好,准备前往中国参战。中国空军首个苏联志愿大队即“俄员队”于1937年11月份成立。^⑦

根据相关资料,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虽然是空军官兵的一种自愿行为,但实际上由军方严密组织。为了组织空军援华志愿队,苏联红军总部专门成立了一个选拔委员会,成员有空军总司令阿尔克斯尼斯(Я. И. Алкснис)和红军总政委加马尔尼克(Я. Б. Гамарни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斯米尔诺夫(П. А. Смирнов)、军长斯莫什克维奇(Я. В. Смушкевич)等,可见,苏联军方十分重视志愿队员的选拔工作。^⑧志愿队员的选拔工作深入军队基层,如驻扎远东隶属于苏联太平洋舰队的海军航空部队И-16第九歼击大队、滨海边疆区第三十二独立И-15歼击大队、茹科夫斯基空军学院第二十三轰炸机大队等,都成为挑选援华飞行员的对象。挑选志愿队员也有一套程序:志愿者自己申请,或者由上级领导动员后申请,或者由上级领导直接征求意见,然后由选拔委员会把关。凡是共产党员、战斗英雄,都有希望被选拔。

一旦被选拔,大部分志愿者就要迅速赶到莫斯科,大体上都要受到红军领导人的接见和鼓励,然后乘火车去阿拉木图集中。阿拉木图是当时苏联援华物资和人员的主要集散地,另外一个集散地是伊尔库茨克。志愿人员前往中国,一般有两条航线。最主要的线路是阿—兰线,共有11个机场:阿拉木图、伊宁(今伊犁)、石河、乌鲁木齐、古城、哈密、星星峡、安西、肃州、凉州、兰州,最后至

① Дубинский А. М.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период японо-китайской войны, 1937—1945. М., 1980, с. 93.

② Титов А. С. К 40 - летию национально-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й войны китай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против японских захватчиков.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74, г. № 4. с. 171.

③ 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 т. 20(01 января - 31 декабря 1937), М., 1976, с. 468.

④ Там же с. 481.

⑤ 孔庆泰、吴菊英:《中国军事代表团与苏联商谈援华抗日械弹记录稿》,《民国档案》1987年第3期,第32页。

⑥ 孔庆泰:《抗战初期杨杰等和苏联磋商援华事项秘密函电选》,《民国档案》1985年第1期,第44页。

⑦ 王正华:《抗战前期的苏联空军志愿队》,第3页。

⑧ Чудодеев Ю. В. «В небе Китая», М., 1980, с. 120, 219.

汉口。该航线的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第一批志愿队来华时就由于沙暴在古城耽搁了15天。机场的设施也十分简陋,跑道上乱石丛生,各类飞行辅助设备极其缺乏,更没有像样的通讯联系设备。在这条西北航线上,为保障援华武器弹药顺利运到中国,苏联专门成立了一个航线管理局。首任局长为波雷宁(Ф. П. Польшин),政委为维特鲁日斯基(И. Д. Ветлужинский)。同时,苏联空军在阿—兰航线上的每个中间机场都设置了空军指挥部,不但配备有各类航空专家及空勤人员,备有燃料、加油设备和粮食,还驻扎有卫队。也有部分志愿人员自伊尔库茨克(或外贝加尔边区)经由乌兰巴托、达兰扎达嘎德、肃州、兰州至汉口。^①自1937年底至1941年,苏联一共向中国派遣各类空军志愿人员包括飞行员、领航员、射击士、机械师等共3665人。^②

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在中国空军系统中一般被称为“俄员队”,具有自己的指挥体系。其内部指挥系统的一般结构为:(一)空军总顾问,实为志愿队的最高领导人,负责援华志愿队的全面工作,包括向中国空军输送和移交所购苏联飞机、督导训练中国空军技术人员事宜及指挥志愿队作战。首任空军总顾问为雷恰戈夫(П. В. Рычагов),旅长,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任期自1937年11月至1938年3月;第二任为日加列夫(П. Ф. Жигарев),空军少将,任期自1938年3月至1938年8月,曾获国民政府四等云麾勋章^③;第三任为特霍尔(Г. И. Тхор),任期自1938年10月至1939年初,亦获国民政府四等云麾勋章^④;第四任为阿尼西莫夫(П. Н. Анисимов),任期自1939年秋至1941年4月;第五任为雷巴科夫(Рыбаков),任期自1941年4月至1942年10月。(二)参谋长,主管命令传达和部队给养。先后任参谋长的有格里戈里耶夫(又译葛力果力耶夫,М. Н. Григорьев),任期自1938年9月至1939年初;伊利亚朔夫(А. М. Ильяшов),任期自1939年初至1940年2月。(三)副参谋长,主管志愿队的政治思想。(四)一般专业性顾问,如工程机械顾问沙哈洛夫(Сахаров)等。^⑤(五)副顾问,即政委。(六)大队长,包括远程轰炸机(ДБ-3)大队长、高速中型轰炸机(СБ)大队长、歼击机大队长(И-15、И-16)。^⑥

当时,中国空军归航空委员会领导,蒋介石亲自兼任委员长,空军司令周至柔为主任,宋美龄为秘书长。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来华后,航空委员会就派了一位姓张的留苏上校率领一群翻译驻扎志愿队,负责中苏双方的联络。国民政府为了让志愿队在飞机失事后随时得到老百姓的救助,特意给每位志愿队员颁发了“护身符”:一块写着“来华助战洋人,军民一体救护(空军前敌总指挥部)”的白布,印有编号。^⑦志愿队驻在汉口时,宾馆里设施齐全,不但备有电影放映厅,放映苏联电影,还专派厨师为他们准备俄餐。^⑧志愿队到达前线后,一般都集中居住在当地的“励志社”里,配有专门的厨师、医生,警卫森严。在战斗的间隙期,志愿队员积极学习汉语,举行音乐会,如机械师齐姆良斯基(В. Д. Землянский),擅长口琴,被称为“空中音乐家”。每当空战胜利,志愿队员就与中国军民联欢,唱起流行的苏联革命歌曲。每逢苏联革命节日,志愿队都要举行庆祝活动。如1938年,恰逢十月革命21周年纪念,驻扎芷江的苏联志愿队与中国军民举行了联欢。志愿队员唱起了《我们的铁鸟越飞越高》,中方则表演了“转飞镖”等杂技,宾主尽欢。^⑨

① Там же с. 288—289, 324.

② Вечным сном спать в китайской земле. М., 1997, г. с. 9.

③ 《俄籍顾问勋奖案》(1),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351/2388,第436、437页。

④ 《俄籍顾问勋奖案》(1),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351/2388,第438、439页。

⑤ 《俄籍顾问勋奖案》(2),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351/2388,第1032页。

⑥ 王正华:《抗战时期外国对华军事援助》,第129—131页。Чудодеев Ю. В. «В небе Китая», М., 1980, с. 364.

⑦ Дёмин А. А. Авиация Великого соседа. Книга 1. У истоков китайской авиации. М., 2008, с. 367.

⑧ Чудодеев Ю. В. «В небе Китая», М., 1980, с. 222.

⑨ Там же, с. 50、147、278、324.

台湾学者大都主张将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在华活动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自1937年11月至1939年夏,为志愿队来华时期;第二个时期自1939年下半年至1940年夏,为欧战爆发后,志愿队人员开始分批返国并协助训练我国飞行员时期;第三个时期自1940年下半年至1941年,为改任顾问时期。^①这种分期看似清楚,其实不然:1. 1939年下半年至1940年夏,期间志愿队并非全部返国,且并非全部协助培训我国飞行员,大部分志愿队仍然参与对日作战。2. 1939年6月后,苏联仍然有空军志愿队来华,如以库里申科(Г. А. Кулишенко)为大队长的ДБ-3重型轰炸机大队(12架)就在这时来到中国。自1939年6月至1940年6月,该大队和另一个由科兹洛夫(Н. А. Козлов)率领的ДБ-3大队,以及由苏普伦(С. П. Супрун)率领的И-15、由科基纳基(К. К. Коккинаки)率领的И-16两个歼击机大队一直驻扎在四川,并未返回苏联。^②3. 至于培训,自苏联空军志愿队来华之日起,就一直不间断地参与培训中国空勤技术人员,贯穿志愿队的始终,既有战地培训,也有航校培训。所以,此种分期不能正确概括当时志愿队在华活动的历史真貌。综合而言,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在华活动略可分为两期:前期自1937年11月至1940年6月,为志愿队来华参战时期;后期自1940年下半年至1942年,苏联由于面临西线战争,撤回志愿队,余10数人任空军参谋学校第一、二期空军战术课程教职。^③留驻兰州的歼击机一中队10架И-16Ⅲ飞机^④也于1942年8月下旬为中国空军第二十九中队接收。^⑤

由于缺乏史料,迄今我们不能确知国民政府聘请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是否像聘请欧美志愿队一样付给报酬。1937年9月17日,杨杰与苏联政府就购买武器举行第四次谈判时,曾提道:“贵方所派之教官及技术工程人员,系敝政府聘请者,自当由敝政府给酬。惟其标准如何,请酌定示知。”俄国谈判代表拔也夫(Баринев)说:“关于此项问题,余等尚未计及。”^⑥可惜,相关细节尚不清楚。1938年4月16日,孙科有密函至杨杰,其中说:“前方希望苏方志愿军参加作战至为急切,从前招待不周之种种错误,我方自应切实纠正,敬请吾兄即向苏方详为解释。至待遇条件,可据前年十一月周主任至柔致兄马电所开各条酌商请派。”^⑦这说明,苏联志愿队还是有“待遇条件”的。但迄今我们尚无法看到周至柔的“马电”,了解其所谈“待遇条件”的具体内容。但据苏联志愿队员的回忆,他们是不拿报酬的。^⑧陈纳德也回忆,苏联志愿队员都在国内领工资。^⑨有资料表明,对于战死在中国的志愿队员,国民政府每人发给家属抚恤金1600美元。^⑩但俄文资料未谈及中国的抚恤金,苏联政府对待牺牲的志愿队员家属,一般以“为巩固苏联国防力量完成政府特殊使命而勇敢牺牲者”名义发给抚恤金17000卢布(相当于4250美元)^⑪,同时另外给家属发一种长期的特定退休金。^⑫

由于当时中苏两国意识形态不同,志愿队员都掩盖了自己的政治身份,彼此互称“先生”而不

① 王正华:《抗战前期的苏联空军志愿队》,第3页。

② Чудодеев Ю. В. «В небе Китая», М., 1980, с. 360.

③ 王正华:《抗战前期的苏联空军志愿队》,第3页。

④ 另说为“9架飞机9名飞行员”。АВПРФ. Ф. 0100, Оп. 23, П. 193. Д. 9, Л. 337.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 Т. IV: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37—1945 гг. Кн. 1: 1937—1944. М., 2000, с. 527.

⑤ 王正华:《抗战前期的苏联空军志愿队》,第3页。

⑥ 孔庆泰、吴菊英:《中国军事代表团与苏联商谈援华抗日械弹记录稿》,《民国档案》1987年第3期,第42页。

⑦ 孔庆泰:《抗战初期杨杰等与苏联磋商援华事项秘密函电选》,《民国档案》1985年第1期,第46页。

⑧ Чудодеев Ю. В. «В небе Китая», М., 1980, с. 69—70, 236.

⑨ 陈纳德著,陈香梅译:《陈纳德将军与中国》,《陈香梅文集》(4),安徽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68页。

⑩ 刘妮玲:《陈纳德与飞虎队》,军事研究编纂委员会编:《抗战胜利四十周年论文集》(上),第713页。

⑪ 二战期间卢布和美元的兑换率为4卢布/1美元。Сладковский М. И. История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СССР с Китаем (1917—1974), М., 1977, с. 184.

⑫ Вечным сном спать в китайской земле. М., 1997, г. с. 9.

称“同志”，党支部活动是秘密的，对外称“同乡会”。第一批来华志愿队的党小组组长是歼击机大队长普罗柯菲耶夫（Г. М. Прокофьев）。当志愿队离开阿拉木图时，基地政委阿列克谢耶夫（В. И. Алексеев）吩咐他：“要根据情况召开党的会议，不要做会议记录，不要编党员名册，将党员记在心中，根据他们的表现来评价他们。党的指示可以从送来的《真理报》上看到。”在阿尼西莫夫任空军总顾问期间，志愿队虽然临近回国，但党组织的生活仍然存在。他们在宿舍安装了无线电台，以了解苏联国内的各种消息，按时庆祝苏联节日。志愿队的几乎所有问题，如战斗飞行、培训中国飞行员、移交飞机等事宜，都由党小组开会决定。^①

许多迹象表明派遣空军志愿队援华是当时苏联实施其远东外交战略的既定举措。首先，志愿队到中国参战都负有秘密使命：一是熟悉日本飞机性能。飞行员古边科（Губенко А. А.）实践的“撞击”战术，就是在此基础上发明的。二是了解日本空军的战术，在战斗中形成了一套对付日本空军行之有效的战术。志愿队总是把所有驱逐机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缠住日本驱逐机，另一部分则直接打击日军轰炸机，使得日机顾此失彼，难逃被击落的命运。三是总结与日军作战经验。每个志愿队员轮换回国后，都要递交总结报告。为此，基于苏联空军副司令斯姆士克维奇（Я. В. Смушкевич）的提议，苏联红军把援助过西班牙和中国的飞行员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检查局，主要任务就是总结推广战斗经验，辅助制定相应的战术文件，局长是苏联英雄谢洛夫（А. К. Серов），副局长是援华空军志愿队员、苏联英雄波雷宁。^② 其次，为了不过分刺激日本，苏联政府从未承认派遣过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当时，苏联的援外行动都有秘密代号，援助西班牙的秘密代号为“X 行动”，而军事援华则被秘称为“Y 行动”。^③ 为了掩盖志愿队员与苏联政府之间的关联，每个志愿队员都起了假名，如机械师齐姆良斯基，名册上名字为捷尔诺夫斯基（Терновский），这是他母亲的姓。^④ 由于志愿队预定的“秘化”措施，整个抗战时期，无论苏联的《真理报》，国民政府的《中央日报》《武汉日报》，中共的《新华日报》等官方媒体都没有报道“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的事迹。他们在报道有苏联志愿队参加的空战时，都只提“中国（我）空军”。但是，并非所有的民间新闻媒体都能体谅中苏政府的苦心。比如有一家在上海法租界内发行的汉文《上海日报》，就明确报道了苏联志愿队援华事迹。^⑤ 其实，日本人也早就知道苏联派遣援华空军志愿队的事实。1938 年 4 月 4 日，日本驻苏大使重光葵曾就此事向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提出抗议，但遭到苏方严厉驳斥。^⑥ 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既然是个人自愿行为，便与苏联政府无关，日本对此亦无能为力。

三、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的功绩

苏联援华的飞机主要有五种型号，其中三种为轰炸机：СБ 快速轰炸机、ТБ-3 重型轰炸机、ДБ-3 远程轰炸机；两种为歼击机：И-15、И-16。这些型号的飞机都是当时苏联乃至世界上最先进的飞机，许多技术参数要优于当时日本的飞机，这也是后来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在对日空战中致胜

① Чудодеев Ю. В. «В небе Китая», М., 1980, с. 198 - 199, 364 - 365.

② Там же с. 36, 51, 89, 191.

③ “Операция Икс” “Операция Игрек”.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 Т. IV: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37—1945 гг. Кн. 1: 1937—1944. М., 2000, с. 11.

④ Чудодеев Ю. В. «В небе Китая», М., 1980, с. 198 - 199, 364 - 365, 337.

⑤ 《苏联正规空军积极助我抗战》，《上海日报》，1938 年 7 月 12 日，第 1 版。《苏联人员来华参加抗战工作》，《上海日报》，1938 年 7 月 30 日，第 1 版。

⑥ 《敌抗议苏联飞机助华，苏联外长严予驳斥》，《新华日报》，1938 年 4 月 6 日，第 3 版。

日本空军的基础。苏联飞机的这种技术优势一直保持到1940年8月日本零式战斗机投入战场为止。

第一批志愿队包括飞行员、领航员和射击士、机械师等各类空勤技术人员,于1937年10月组建,10月10日前往中国。包括一个СБ快速轰炸机大队和一个И-16歼击机大队。СБ大队(21架)共153人,由马琴(Марченков М. Н.)任大队长,于1937年11月21日到达南京前线。И-16大队(23架)共101人,原本由库尔丘莫夫(В. Курдюмов)任大队长,飞机经过阿—兰航线中间的凉州机场时,由于机场条件极差,导致飞机失事,库尔丘莫夫牺牲,遂由普罗柯菲耶夫代行大队长之职。紧接着,另一队СБ快速轰炸机约35人在波雷宁的率领下亦到达中国。此后,在1937年12月、1938年1月,又陆续派遣了И-15歼击机大队约99人(其中飞行员39人)。^①据统计,到1939年2月中旬,先后到中国的志愿飞行员达712人。1939年夏是志愿人员最多的时候,达到400多人。^②自1938年1月至1940年,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的数量和兵力部署情况如下:

1938年1—5月:轰炸机第一大队(СБ,41架)驻汉口、南昌;驱逐机第一大队(И-16,39架)、第二大队(И-15,38架)驻南昌、汉口、广州。

1938年6—12月:轰炸机第一大队(СБ,18架),驻汉口、南昌、吉安、衡阳;驱逐机第一大队(И-15,9架;И-16,16架)、第二大队(И-15,22架;И-16,8架)驻南昌、汉口、衡阳。

1939年:轰炸机第一大队(ДБ-3,18架)驻温江、重庆、芷江、桂林;轰炸机第二大队(ДБ-3,24架)驻兰州、成都;驱逐机第一大队(И-15,26架)、第二大队(И-15,22架)驻兰州、成都、重庆、芷江、零陵、衡阳、柳州、桂林。

1940年:轰炸机第一大队(СБ,12架)驻桂林、成都、梁山、南郑、天水、兰州;轰炸机第二大队(ДБ-3,11架)驻成都、兰州;驱逐机第一大队(И-15,30架)驻桂林、重庆;驱逐机第二大队(И-16,13架)驻桂林、重庆、兰州。^③

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作用于中国空军,主要体现于两个方面:

(一)培训中国空军空勤技术人员,重塑中国空军的“肌体”。

苏联空军志愿队培训中国空勤技术人员主要有三种方式:

首先是基地培训。苏联飞机到达中国后,部分飞机需要移交中国空军。但中国空军此前没有操作过苏联飞机,因此需要在基地进行短期培训,让中国空军掌握操作苏联飞机的一般技能。为此,苏联派遣各类空勤技术人员计89人。前期培训基地主要设在兰州、哈密、樊城,后期即1939年以后,四川邛崃、温江也成为培训基地。中国空军第一大队的第一、四、九中队(СБ),第二大队第二、六、十一、三〇中队(СБ),第三大队第七、八、二十八中队(И-15、И-16),第四大队第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中队(И-15、И-16),第五大队第十七、二十六、二十七中队(И-15、И-16),第六大队(СБ),第八大队第十一、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中队(ДБ-3、ТБ-3、СБ、И-15、И-16),第十二大队(СБ)都在兰州、哈密、樊城、温江、邛崃等基地进行培训。1938年,共培训飞行员104名、轰炸员50名、通讯员38名、射击士119名。1939年9月,培训驱逐机战斗人员213名。^④以龚业梯所在中国空军第四大队为例,该大队在高志航的率领下于1939年9月21日离开南京前往兰州接收苏联飞机。他们于9月28日到达兰州,但苏联飞机未到,他们便开始学习简单俄文。10月22日,苏联轰炸机到达兰州,23日上

① Чудодеев Ю. В. «В небе Китая», М., 1980, с. 105. Военная помощь СССР в 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й борьбе китай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М., 1975, с. 62.

② Яковлев А. Г. СССР и борьба китай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против японской агрессии (1931—1945 гг.). В кн.: «Ленин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СССР в отношении Китая», М., 1968, с. 104, 106.

③ 王正华:《抗战前期的苏联空军志愿队》,第4—5页。

④ 王正华:《抗战前期的苏联空军志愿队》,第11—13页。

午,中国飞行员即到机场听苏联人讲解飞机的结构和性能。随后,由志愿队员率领中国空军做特技飞行训练。志愿队员先做一遍,然后中国空军模仿。大约1938年1月10日以后,经过培训,许多苏联飞机移交中国空军,陆续飞往江浙前线。龚业悌学习驾驶И-15,除了熟悉飞机仪表及性能,还学习特技飞行、打靶、空中格斗,直到2月17日,方飞临武汉抗战前线。^①

其次是战地示范。苏联志愿队员在战斗中言传身教,把自己的战斗经验传授给中国的飞行员。^②每次战役后,志愿队领导人都要召集中苏飞行员开总结会。如1938年5月4日,总结“4·29”空战,中国空军以极少量飞机试图牵制大量日本飞机的冒险行为就遭到了苏联军官的批评。大约自1938年9月以后,苏联志愿队开始经常在战斗间隙临时设立“战地讲堂”。9月14日,战地讲堂上午开讲两小时,下午一小时,由尼克莱主讲“高位、低位、等位追摄的各种战斗法”;9月15日下午,由机械师讲“И-15、И-16的飞行仪器和检查方法”;9月16日,“上两堂俄文,又是从字母、发音学起”;9月23日上午,“每人练习飞三个或两个起落”;10月15日,按照苏联军官的规定进行战斗队形练习。^③这种战斗间隙的临时“战地讲堂”针对具体问题,十分高效。

其三是航校培训。在苏联志愿队员和专家的帮助下,战时中国在伊宁、兰州、成都、绥宁等地筹办了多所航校,培训空勤技术人员。其中比较大型的有伊宁空军教导队。1939年8月,杨杰大使与苏联签署了聘请苏联教官到即将开办的伊宁航校任教的协议。^④11月,伊宁空军教导队正式开办,地点在伊宁北郊的阿林巴克。该校成立伊始便初步制定了经苏联国防部同意的培训计划:每期收学生200名,其中学习轰炸、驱逐、机械各50人,学习通讯30人,练习机53架,学期半年或七个月。^⑤但国民政府并未完全按照这份计划来实施培训,首批受训人员就达547人。教导队总队长为杨鹤霄,副队长有三人,其中一人为苏联教官李维诺夫(Литвинов)。教学形式主要分为理论课和训练课。理论课实行小班制,每班25人,科目有发动机学、飞机学、仪器学、航行学、军械学、轰炸术、气象学、飞行原理、空军战术等,教材都采用苏联教材。^⑥训练课主要是试飞,分两阶段实行:第一阶段为各级部队长及飞行教官的训练;第二阶段为受训学员的训练。过程包括上课、实习、带飞、单飞、编队飞行、空中战斗、投弹射击、侦察照相相等。^⑦1940年,伊宁空军教导队培养了328名飞行员。^⑧该校的苏联教官自1940年7月至1942年8月又依约延长了两年服务期限。^⑨此外,还有成都雅湾空军技术学校^⑩、重庆空军学院等。^⑪这些航校培训的飞行员后来成为中国空军的骨干。

(二)志愿队驾驶战机,直接参战,打击日本法西斯。

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到中国直接参战,主要从四个方面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① 龚业悌:《抗战飞行日记》,第183—237页。

② Яковлев А. Г. СССР и борьба китай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против японской агрессии (1931—1945 гг.). В кн.: «Ленин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СССР в отношении Китая». М., 1968, с. 105.

③ 龚业悌:《抗战飞行日记》,第341—365页。

④ АВГРФ. Ф. 100, Оп. 25, П. 200. Д. 7, Л. 107.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 Т. IV: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37—1945 гг. Кн. 1: 1937—1944. М., 2000, с. 611.

⑤ 王正华:《抗战前期的苏联空军志愿队》,第14页。

⑥ 劳家彦:《伊宁空军教导队杂忆》(1),《中国的空军》第560期,1986年,第24—25页。

⑦ 李继唐:《冰天雪地学飞行——忆抗战空军伊宁教导总队》(下),《中国的空军》第564期,1987年,第26页。

⑧ Яковлев А. Г. СССР и борьба китай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против японской агрессии (1931—1945 гг.). В кн.: «Ленин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СССР в отношении Китая», М., 1968, с. 105.

⑨ АВГРФ. Ф. 100, Оп. 25, П. 200. Д. 7, Л. 108; АВГРФ. Ф. 100, Оп. 27, Д. 2, Л. 47.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 Т. IV: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37—1945 гг. Кн. 1: 1937—1944. М., 2000, с. 611, 655.

⑩ Чудодеев Ю. В. «В небе Китая», М., 1980, с. 350.

⑪ АВГРФ. Ф. 0100, Оп. 24, П. 196. Д. 6, Л. 98.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 Т. IV: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37—1945 гг. Кн. 1: 1937—1944. М., 2000, с. 614.

1. 直接迎击来犯日本空军。苏联空军志愿队在援华初期参加了多次轰轰烈烈的中日大空战。首先是南京空战。1937年11月21日,第一批苏联空军志愿队И-16大队(23架)在普罗柯菲耶夫(Прокофьев Я. П.)的率领下到达南京。当天20架日机来袭,志愿队7架И-16升空截击。3架日机(2架驱逐机,1架轰炸机)被击落,我方无损。11月22日,志愿队6架И-16与6架日机战斗。11月24日,12架日机袭击南京,6架И-16升空截击,志愿队损失3架。12月1日,日机大举来袭,志愿队连续升空五次截击,击落10架轰炸机、4架驱逐机,损失两架И-16,1位飞行员跳伞得到当地农民的救助。12月2日,日轰炸机群在20架96式驱逐机的护卫下空袭南京,志愿队奋起迎战,激战半小时,击落1架日机,损失3架^①,飞行员安德烈耶夫(Андреев)牺牲。迄12月12日南京陷落前,苏联志愿队共击落日机20架,飞行员库德莫夫(Д. А. Кудымов)击落日本空军四大天王之一的白相定南^②,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其二是南昌保卫战。1937年12月14日,日机21架袭击南昌,中苏飞机联合升空截击,击落日机。12月22日,志愿队升空截击,大队长布拉戈维申斯基(Благовещенский А. С.)击落日机一架,毙日指挥官大井法人大尉。^③1938年2月25日,日机56架袭击南昌,志愿队升空截击,击落日机8架,日酋官田雄大尉毙命,志愿队损失飞机7架,斯米尔诺夫(С. Смирнов)等三人牺牲。^④6月26日,日机46架袭击南昌,中苏联合拒敌,击落日机6架,损失2架,史托维(Штурмин А. Д.)牺牲。^⑤7月4日,日机56架袭击南昌,志愿队28架升空截击,击落日机7架。7月7日,日机再犯南昌,志愿队截击,击落日机10架,损失7架,奥帕索夫(К. Опасов)、索霍洛科夫(Ж. Сухоруков)牺牲。^⑥7月18日,日机27架袭击南昌,中苏空军28架迎战,击落日机4架,击毙日空军四大天王之一的南乡茂章,中方13架被击毁。其三是武汉空战。1938年2月18日,日机36架袭击武汉,中苏空军29架截击,击落日机12架。4月29日,日军为庆祝天皇生日,派飞机54架进犯武汉,中苏空军64架严正以待,击落日机36架,中方被击毁2架。^⑦5月31日,日机54架袭击武汉,中苏空军出击,击落日机14架,中方被击毁2架。8月12日,日机70架进犯武汉,中苏空军迎击,击落日机5架,中方被击毁5架^⑧,毁灭性地打击了日本空军不可一世的神话。其四是衡阳保卫战。1938年10月8日至11日,日机先后出动69架飞机连续轰炸衡阳,导致6架СВ轰炸机被毁,志愿队大队长拉赫曼诺夫(А. С. Рахманов)牺牲。其五是洛阳空战。1938年除夕,日机32架空袭洛阳,志愿队12架飞机迎敌,被击毁飞机1架,牺牲1人。^⑨其六是柳州空战。1940年1月10日,日机54架袭击柳州,中苏空军迎击,击落日机3架,飞行员列

① 另有资料记载:当日志愿队无损,击落6架日机。Лашков А. Ю., Голотюк В. Л. 100 лет Военно-воздушным силам России (1912—2012 годы), М. 2012г. с. 264—265. Чудодеев Ю. В. «В небе Китая», М., 1980, с. 203.

② Чудодеев Ю. В. «В небе Китая», М., 1980, с. 125.

③ 李裕主编:《中苏美空军抗日空战纪实》,第94页。

④ 李嘉谷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33—1945)》,第203页。Чудодеев Ю. В. «В небе Китая», М., 1980, с. 83、146.

⑤ 李嘉谷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33—1945)》,第210页。

⑥ Там же с. 168—170. 此处日期尚待进一步考证,疑即7月4日空战。

⑦ 李裕主编:《中苏美空军抗日空战纪实》,第103页。此处数据诸书有异,另有异说:日机45架进犯,中苏64架迎战,击落日机21架,击毙飞行员50人,活捉两名,自损12架。高晓星、时平编:《民国空军的航迹》,海潮出版社1992年版,第285页。Чудодеев Ю. В. «В небе Китая», М., 1980, с. 48.

⑧ 高晓星、时平编:《民国空军的航迹》,第288页。但唐学锋所引数字为:日机120架进犯,中苏40架迎击,击落日机16架,自损5架。唐学锋:《中国空军抗战史》,第129页。

⑨ 《西工文史资料》第1辑,洛阳市西工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7年编印,第15—17页。不过关于洛阳空战另有异说,留待甄别:(1)1938年1月30日,日机21架袭洛阳,И-15升空迎敌,击落日机3架。惜未言明谁驾驶战机(龚业梯:《抗战飞行日记》,第225页)。(2)1937年12月12日,洛阳空战,志愿队1架与日机1架同归于尽,5名志愿队员牺牲[南秀瑾:《苏联空军在洛阳》,《银川文史资料》第3辑(内部发行),银川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6年编印,第169—170页]。(3)俄方统计,有4位志愿队员牺牲在洛阳(Вечным сном спяты в китайской земле. М., 1997, г. с. 44.)。

济克(Резинк)牺牲。

2. 主动出击,轰炸日本军舰和机场。1937年12月2日,志愿队9架轰炸机在科兹洛夫(Козлов)率领下袭击了上海长江口日本舰队和上海机场,炸毁日舰7艘。1938年1月26日,志愿队轰炸南京机场,炸毁日机48架,飞行员甫多温(Вдовин)、射击士科斯金(Костин)、领航员富拉洛夫(Фролов)牺牲。1938年2月23日,为纪念红军节,志愿队28架轰炸机奇袭台湾松山日本机场,炸毁日机40架,焚毁机库和三年的燃料储备。^①6月10日,志愿队5架轰炸机炸沉长江日舰1艘,炸伤1艘。6月20日,志愿队轰炸机炸沉长江日舰1艘。整个6月,志愿队出击14次,炸沉日舰6艘,炸伤10余艘。^②7月27日,志愿队轰炸长江日舰,炸沉4艘,伤3艘。整个7月,中苏空军炸毁日舰12艘,伤29艘。8月,中苏轰炸机袭击长江日舰,共炸毁日舰9艘,伤23艘。^③

3. 配合地面部队打击日军的交通运输及进攻部队。1938年,为配合中国陆军保卫武汉,志愿队于9月27日、10月3日、5日轰炸罗山日炮兵阵地。1939年11月至1940年1月桂南会战中,志愿队于12月21日轰炸钦州湾日舰,扫射昆仑关日军阵地。22日,志愿队掩护陆军攻击昆仑关日军阵地、轰炸南宁日据点。25日,志愿队轰炸九塘日军阵地,助陆军攻占日据点4—5处。31日,志愿队轰炸南宁机场,毁日机8架。1940年1月10日,志愿队轰炸南宁机场,毁日机3架。^④根据张冲的报告,自1939年7月至1940年6月,志愿队为配合陆军作战,轰炸了日军重要据点如武汉、岳阳、钟祥、运城等,共“炸毁击落日轰炸机90架、驱逐机37架、军舰3艘、兵车数列、油弹库器材数处,汽车战车60余辆、汽油数百箱及阵地工事多处,又炸毙日航空人员300余人,与日海陆军官兵甚多”^⑤,有力地配合了陆军的攻防。

4. 保卫大后方。武汉战役后,中国空军的主要任务变为保护兰州、四川等大后方。日军也针对中国抗战大后方制定了“田号”“100号”“101号”“102号”轰炸计划,主要空袭四川、重庆、兰州等大后方基地。日空军屡袭兰州,最著名的有三次:1939年2月12日,日机30架袭兰州,遭到驱逐;2月20日,日机30架空袭兰州,中苏空军40架升空截击,击落日机9架,击毙63名日机组人员;2月23日,日机57架袭击兰州,中苏空军出击,击落日机6架。^⑥另外,12月26日至28日,日机每天出动上百架飞机空袭兰州,中苏空军顽强抗击,击落数十架日机。1939年6月,志愿队一个驱逐机大队驻扎重庆,日机遂改为夜间空袭。7月6日,30架日机夜袭重庆,中苏空军迎击,击落日机1架,损失1架,志愿队队员布达依采夫(Бдаицев С. К.)牺牲。获悉轰炸大后方的日机场在汉口后,中苏空军策划袭击汉口日机场。1939年10月3日,大队长库里申科率29架ДБ-3重型轰炸机袭击汉口日机场,炸毁并重创日机64架,炸死日空勤人员130多人,炸伤300多人,7名高级军官死亡,12名高级军官受伤,汽油库持续燃烧三个多小时。10月14日,库里申科率20架ДБ-3再袭汉口机场,炸毁日机36架,日军伤亡惨重。大队长库里申科、领航员卢金(И. Д. Лукин)、射击士费多谢耶夫(С. А. Федосеев)牺牲。^⑦

关于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的战绩,由于缺乏完整的统计资料链,无法精确统计。综合现有资

① Там же с. 32, 37, 41, 207, 214.

② 唐学锋:《中国空军抗战史》,第129页;另说,6月份炸沉日舰30艘,炸毁日机20余架(高晓星、时平编:《民国空军的航迹》,第298页)。

③ 高晓星、时平编:《民国空军的航迹》,第299页。

④ 李嘉谷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33—1945)》,第211—228页。

⑤ 王正华:《抗战前期的苏联空军志愿队》,第19—20页。

⑥ Чудодеев Ю. В. «В небе Китая», М., 1980, с. 268, 267.

⑦ Дёмин А. А. Авиация Великого соседа. Книга 1. У истоков китайской авиации. М., 2008, с. 400; Чудодеев Ю. В. «В небе Китая», М., 1980, с. 385, 369, 371.

料,自1938—1941年,中苏空军联合作战,共击落、击毁日机达446架,毁伤各类日舰100多艘,可谓战功卓著。^①为此,苏联空军志愿队也付出了巨大牺牲。据苏方统计数据,自1937—1941年间,约211人牺牲(包括战斗中阵亡和飞机失事而亡)在中国。其中,尚有47人(1937年1人、1938年39人、1939年4人、1940年1人、1941年2人)不知道遗骨埋藏地点。^②

苏联空军志愿队作为二战时期苏联在远东实践其外交战略的重要手段,以自己的战斗和牺牲实现了战时苏联远东外交战略的目标,所以,苏联政府给与志愿队员以崇高的荣誉。志愿队队员中因功被苏联政府于1939年2月22日授予苏联英雄荣誉称号的有14名:布拉戈维申斯基、博罗夫科夫(О. Н. Боровков)、盖达连科(Гайдаренко С. С.)、古边科、兹韦列夫(Зверев В. В.)、克拉夫琴科(Кравченко Г. П.)、马尔琴科夫(Марченков М. Н.)、尼古拉延科(Николаенко Е. М.)、波雷宁、西利瓦诺夫(Селиванов И. П.)、斯柳萨列夫(Слюсарев С. В.)、苏普伦、苏霍夫(Сухов И. С.)、赫留金(Хрюкин Т. Т.)。^③另有14人被授予列宁勋章,193人被授予红旗战斗勋章,125人获得红星勋章。^④历史上,俄罗斯是一个尚武民族,战功勋章在民族意识里代表着等同生命的荣誉。勋章既是苏联政府对志愿队员援华战斗功勋的表彰,也是志愿队员自身生命价值的一种崇高体现。

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帮助中国重建空军,中苏空军联合作战,打破了日本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创造了辉煌的战绩,为中国抗战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约有430多名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队员受到国民政府的表彰,被授予各种等级的“云麾勋章”。^⑤新中国成立后,新闻媒体如《人民日报》《长江日报》^⑥等都曾多次报道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的事迹,武汉、重庆、南京、万州等地相继修筑了有关苏联援华志愿队烈士纪念碑,中国政府还将苏联援华空军烈士库里申科的事迹纳入了国家爱国主义教育体系。可见,数十年来,自中国政府乃至民间一直在不断缅怀苏联空军志愿队援助中国抗战的事迹。^⑦

[作者陈开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马晓娟)

① 李嘉谷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33—1945)》,第197—198页。中俄许多资料有关战绩数据都明显夸大。如俄国国有学者认为:自1937—1941年,苏联志愿队击落了1200架日机,显然统计有误。Горбачев Б. Китайский фронт. Азия и Африка сегодня. 1995, №7. с. 21.

② Вечным сном спяты в китайской земле. М., 1997, г. с. 9. 但依据中方统计数据,自1937年8月至1940年3月,受伤志愿队员约122人(战斗受伤68人、失事受伤54人),阵亡志愿队员约135人(包括战斗中阵亡74人,失事而亡61人)。陈慈蓉:《抗战初期苏联对华外交与军援》,第18页。但该统计数据未包含1940年至1941年的数据。另外,尚有217人一说,但未注明资料来源。姚峻主编:《中国航空史》,大象出版社1998年版,第103页。

③ Джого И. М., Кузнецов И. И. Герои боев с японскими захватчиками в Китае. История СССР, 1972, №3. с. 106—112.

④ Дёмин А. А. Авиация Великого соседа. Книга 1. У истоков китайской авиации. М., 2008, с. 457.

⑤ Варганов В. Н. Военная помощь СССР китайскому народу накануне и в годы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1937—1945). М., 1990, с. 267.《俄籍顾问勋奖案》(1、2),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351/2388。

⑥《人民日报》自1949年以来,有28篇新闻稿报道苏联援华志愿队事迹;至于《长江日报》的有关报道,参见张鸿彦《寻访二战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后裔日记》,《中俄关系史研究通讯》2014年第29期;胡洁:《13位烈士身份初步还原》,《长江日报》,2013年8月5日,第4版。

⑦ 陈开科:《中国史学中的苏联空军援华志愿队》,《湖南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